

達賴喇嘛的申訴

趙有文

民國六十年元旦日，新德里路透社電，達賴喇嘛在邁索各難民營區，訪問一萬名西藏難胞時，他曾在邁索省的蒙高，發出神聖莊嚴的誓言：「西藏人民將繼續奮鬥，以使他們的故鄉，自中共的統治之下，解救出來！」

他說：

「我非常希望我們的目標將會實現，因為，真理站在我們這一邊！」

然而，回溯中國近代史上最慘痛的一頁，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一年後，中共揮師入藏，竊居藏東。又九個年頭，達賴在他的「非暴力主義」，亦即「不抵抗主義」的大前提下，他和西藏同胞對於中共的殘暴酷虐，變本加厲，終告忍無可忍，從而，爆發了舉世矚目的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同胞反共抗暴壯瀾浪潮。

抗暴行動的最後結果，是成千累萬的西藏同胞，拋棄自己的家園、牛羊和牧場，西藏難胞組成了浩大無比的流亡行列，攀援世界的屋脊，大量流入印度。從那個悲慘的時刻開始，藏胞抗暴成為全球各地報紙的重大新聞，引起了全人類的關切和同情。然而，自從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僑

居，藏胞的怒吼也漸次的歸於沉寂。一直到將近十年後的今天，當中華民國欣逢花甲之慶，全國同胞馨香禱祝國運重開，蔣總統號召全國軍民導發再次革命的同日，達賴從他的行宮裏走了出來，向舉世人士發佈了他的誓言，繼續奮鬥，重返家園。和蔣總統的偉大號召相呼應。我們認為這是有特殊意義的。

西藏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她和中華民國具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達賴十四世本人的坐床典禮，即由中央特派當時的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親臨主持，隨同吳忠信氏同往的，刻在臺灣尚有周昆田先生等人。達賴十四世所發表的「吾土與吾民」，係由達賴十四世口述，大衛·荷華斯執筆，刊載於民國四十九年五月二十日至六月十日間的倫敦泰晤士報星期特刊。全文對於達賴十四世「靈童轉世」被發現的經過，由青海塔爾等赴西藏拉薩的迢遙旅程，坐床大典的儀式，「中共軍」之入侵，以及西藏同胞的瀕臨飢餓邊緣，達賴和毛澤東三度會晤，停留匪區一年的印象，還有西藏民變，中共報復的一頁血淚史實，最後是西藏抗暴運動詳情，他率部流亡出藏的旅程。

我們相信這是血淚申訴的紀實作品。

「吾土與吾民」一文，在由英國人執筆英國報紙刊載，乃至達賴和數以萬計的藏胞僑居於印度的情況之下，內中有若干口吻與措詞，鑒於近百年來英國積極侵藏，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誠然有令人不無置疑之處。可是，我們對達賴和流亡國外的藏胞，唯有一片同情與諒解，而且，基於蔣總統「不是敵人，就是同志」的昭示，對於堅決反共，備受中共欺凌迫害的達賴喇嘛，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和全體藏胞，都將是來日我們反攻大陸時的戰鬪伙伴。因此，筆者特將「吾土與吾民」一文，摘要譯出刊載，讓達賴喇嘛的血淚申訴，給這妥協聲浪，甚囂塵上，對中共存有幻想，以及希望與中共和平共存的鴿派人士，美英加等國的少數份子，施以當頭棒喝。同時，也留存下這一段珍貴的歷史文獻，使中外雜誌海內外的讀者，更深一層的認識中共猙獰可怖的面目。

還有一點關於西藏與內地的關係，筆者在文末特附以王成聖教授早年在「中國憲政」一卷四期發表的「關於藏族與西藏地方」一文就西藏和中國有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以及漢藏民族間平

訴申的嘛喇賴達

等相處的問題，有極爲公正平實的論評，幸請海內外關心西藏問題人士加以正視。以下是達賴「吾土與吾民」一文的重點。

從達賴十三世談起

一九五〇年中共揮師入藏佔據東部時，我和藏民們俱感孤立無援局勢無望，乃向若干重要國家和聯合國呼籲，請求干涉，不意均遭拒絕。古代西藏爲軍力強盛之邦，歷數百年之久，自千餘年前佛教由印度傳入後，一向崇尚和平，以全藏專注於宗教生活，故物產並不豐富。

外援既告無望，不久，我人憐於中共軍勢的强大，於是派遣代表團赴北平，希望締結一項不屈辱之條約，豈知迫於威勢竟訂了一個喪失主權的協議。西藏政府雖不願批准，但事實極爲明顯，倘加拒絕，則隨之而來者必爲更大的流血和破壞。爲了拯救人民免使災禍加深計，我和西藏政府力圖遵守諾言，但中共對其一手製造的協議，却背諾失信，從不履行。

本人堅決信仰非暴力主義，此種主義係我佛如來首先倡導，近世更有印度先哲聖雄甘地身體力行。所以開始我竭力反對藉武力保衛自由，曾窮數年之力尋求與中共和平合理解決的途徑，並盡量阻撓使用暴力，甚至開罪衆多人民，亦所不顧。前後九年，我不斷向仍在西藏政府轄下的人民，諄諄勸導，勿以武力對抗中共的壓迫，良以此舉既違反人道，並使雙方交受其害。無奈在藏東已經淪陷的地區，音信阻隔，我和政府均無法行使其影響力。該區人民紛紛起義抗暴，最後中共入侵部隊益變本加厲，全體藏民至於忍無可忍。本人在本文內當儘量把事實公開，其結論如何

聽由讀者自行衡斷。但必須補充聲明的，中共駐藏部隊雖對我人橫施暴虐，西藏人民對於偉大的漢族並無仇恨，其唯一的願望爲恢復固有的安定生活……。

一九三三年第十三世達賴圓寂，噩耗傳來，全藏人民無不悲悼。爲報答其在世時爲國家求和平爲人民謀福利的德意，決定在布達拉宮內爲其營建金陵，以示崇敬。並積極尋覓其轉世的靈童，因爲每代達賴喇嘛，均爲其前一輩的化身。第一代達賴出生於一三九一年，是觀世音菩薩下凡，菩薩曾許下宏願，要普渡衆生。依例，先由全藏代表大會推舉攝政一位，在靈童尋獲以迄成年期間，代行達賴的政教大權；其次由攝政祈求神示，並商同高僧等研究達賴轉世的地點。當時在拉薩東北方常可看到祥雲繚繞，又達賴在羅布林閣夏宮圓寂時，法身原面南而坐，但數日後忽轉向東方，同時夏宮東北方木柱上忽生星狀大菌一個，種種跡象均指出達賴降生的方向。

一九三五年，攝政前往拉薩東南約九十哩處的聖湖，藏人感信在此湖中可以看出預示景象，此類聖湖西藏共有好幾處，不過以此湖最爲著名。攝政祈禱數日後，在湖中首先看到阿、噶、瑪三個藏文，其次看到一座金碧輝煌的寺廟，和一所綠色瓦頂民房，乃將所見情形一一錄下，並嚴守秘密。次年派遣高僧大員分赴西藏各地，依照攝政在聖湖所見尋覓達賴降生地。其東路人員由格倉喇嘛率領，在青海塔爾寺附近見到有綠色瓦屋人家，並有二歲男孩一個，於是由格倉喇嘛化粧爲僕，隨行人員化粧爲主，前往投宿，當二

歲男孩看到該僕就要爬上身去坐在膝上，其時僕頭上懸掛第十三世達賴念珠一串，孩子似乎認得，請求贈與，僕人答以倘能說出他是何人即可贈送，那孩子就指出他是色拉寺喇嘛。次晨一行向屋主告辭，那孩子忙從床上爬起，硬要跟他們同走。那個孩子便是本人。此時我的父母尚不知這人的真正任務。幾天過後，全體尋覓靈童大員，都到了我家，看到這麼多的貴客臨門，意識到我可能是活佛轉世。西藏喇嘛轉世的很多，我的長兄便是一個，但沒料到我就是達賴喇嘛轉世。

靈童們普通都能記憶前生的事物，有的甚至能背誦從未學過的經典。這批大員就把第十三世達賴所用的念珠、小鼓、拐杖等物，混雜在同類物件之中，我都能一一辨識無誤，經過這許多考驗，加上攝政在聖湖中所看到的三個藏文，剛好和我出生的地名及村後山上的寺名首字相合，使他們愈益相信我便是他們所要找的轉世靈童。再加從前第十三世達賴由內地返藏經過本村，曾在山上寺內駐錫，家父時年九歲曾隨往迎接，他在寺內留下僧鞋一雙，並向我家注視良久，盛讚是個好地方。經參證這些事實，遂皆深信不疑，於是將靈異情形電告拉薩，不久就接到回電，予以承認，一面開始籌備迎我入藏事宜，其間曾歷時兩年之久。在這兩年裏面我被留在西寧塔爾寺裏年才三歲，一旦和父母分離，初時心中當然不樂，和我同在一起的，除了大哥哥外尚有叔父和五歲的三哥。一九三九年六月初，我等啓程赴藏，在路上得動身的那天，是我四週歲後的一星期，在路上共走了三個月又十三天。一行計有人員五十個驢馬三百五十四，包括西藏官僧、我的家屬等在內

。西藏沒有車輛，也沒有行車的道路，我和三哥都是坐在駕於兩頭驢背上的轎篷內，行至峻險之處，則由隨員輪流負抱。每天黎明上路中午歇腳，這是西藏旅人的通規，晚上住在蓬帳裏，因為沿途居民稀少，除了偶有幾個牧民前來求我賜福外，幾個星期看不到人煙。

國府大員主持坐床

當我甫離青海省轄境，拉薩立即召開全藏僧



達賴喇嘛坐在布達拉宮的寶座上。

俗民衆代表大會，先將攝政在聖湖所見的形象，對我的各項考驗，以及十三世達賴暗示的轉世地點，一一提出報告。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確認我是達賴轉世，並分派要員沿途迎接。我們遇到第一批迎駕大員時，我們登程已將三月，領隊帶了十個人員一百袋食品，另隨帶皮筏四個助我等渡河，因此隊容漸盛。數日後通過唐古喇山口到達黑河市，離拉薩不過半個月路程，遇到第一批迎駕大員，也呈獻哈達三寶等物以示崇敬。到了這時

，家父母才確知幼子是達賴轉世，驚喜交集，感激莫名，幾疑身在夢中。在離拉薩十站路處，又遇一批人馬來接，由噶倫（內閣部長）一人率領，計人一百驢馬無數，拉薩三大寺均有代表在內，並帶了攝政、噶廈（內閣）及代表大會聯銜通告，宣布我是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於是請我脫下邊裝披上僧袍，坐進金漆大轎，從此隊形極為壯觀。每過一村一鎮，喇嘛僧衆無不手持旌旗列隊恭迎，隨即併隊同行，一時鼓鈸齊鳴，香煙繚繞。旋抵達爾瑪宗，攝政及大仲譯親自來迎，隊伍停了下來，在熱振寺住了三天。及抵隆珠宗，所有在拉薩留守的大員、首席噶倫、噶倫、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堪布（即方丈）全部來迎，英國駐藏商務專員黎吉生（Herb Richardson）也同來迎候。

此時離拉薩已不遠，前行未久，有中央駐藏代表及不丹、尼泊爾代表來接，故隊形極長，浩浩蕩蕩，向聖城進發，僧侶手執彩旌佇候道旁，人民歌樂喧天，全體藏軍舉槍致敬，拉薩闔城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穿着最華貴的衣服，人山人海夾道恭迎。我這時我覺得彷彿如夢，又像身入仙境。到了拉薩之後，當被引入廟內向諸佛膜拜，全隊續向夏宮羅布林岡行進，及至到達目的地，我遂被接入這座前輩達賴所居的宮室，這時候腦際仍是飄飄盪盪尚未完全清醒。

在我到達拉薩後不久，即照擇定的黃道吉日，於一九四〇年正月十四日舉行坐床大典。事前曾呈報國民政府並電英國駐印督署、尼泊爾國王及不丹錫金大君。坐床大典是在布達拉宮舉行，參加者有鄰國外交代表、西藏政府僧俗官員、轉世喇嘛、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堪布和我的家人。（按中央國民政府特派吳忠信赴拉薩主持坐床大典，詳見中外雜誌第一卷、二、三期周昆田懷念吳忠信先生。）

典禮開始時，由布達拉宮誦經班朗梵唱；次

訴申的喇嘛賴達

由攝政進獻三寶，復由攝政、首席噶倫獻上哈達。此後有衛士一隊由侍衛率領向我呈獻甘露，杯碟均用赤金製成，殿內每人亦各進一杯。其次為獻茶，復次則為獻甜飯；在進獻此等飲食時，同時有高僧二人講經論典。這一節目完畢，即有兒童一隊表演滑稽，一面伴奏音樂接着繼續講經，同時獻菓獻糌粑。嗣攝政代表政府獻寶，攝政於說明其重要意義後，報告尋覓靈童經過情形，宣布我是西藏最高政教領袖。旋由政府僧俗官員進獻禮品，進獻完畢，我就向大眾一一賜福答禮。次接受各國代表致送哈達，我也以哈達回贈。繼將殿中各色菓品分送全體享用，接着又表演滑稽及化裝舞蹈。

典禮的最後一個節目為二僧人賦詩，祝頌達賴萬壽無疆，佛教風行全球，和達賴治下藏民安樂，我特別為他二人祝福，並賜以哈達，大典就此完成。禮畢，轉入別殿，接收全部印信，並在令行各寺的公文上蓋用，初次象徵性的行使統治權。由是，我這四歲半的孩子，遂被正式公認為統治全藏僧俗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此時全體藏人似皆以為前途幸福無窮。嗣後雖年齒日增，我對世事尚茫無所知，當我十六歲時，不得不親自秉政，領導全藏抵抗中共的進攻。

中共入藏偽刻印章

一九五〇年中共未經正式警告即冒然入侵，藏軍藉本地康巴族勇士之助，在某數地點曾予擊退，惜衆寡懸殊配備窳劣，難期長久抵抗。當藏邊發生戰事之際，拉薩政府曾禱求神示並召集重

要喇嘛會商，結果，噶倫等晉見，鄭重請我親政，這事使我異常憂慮，當時年方十六，佛學根底未固，國際情形茫然無知，政治經驗又復缺乏，自知識識俱淺，不克負此重任。

正當我躊躇莫決的時候，代表大會決定請我親政，鑒於當茲國家興亡關頭，責無旁貸，祇有勉負艱鉅，於是童年生活不得不提前結束，立即準備親自領導全藏，竭其所能以抵抗中共的龐大壓力。我誠惶誠恐接受了此項請命，遂按傳統儀式拜領全權，並赦免罪犯，所有全藏獄犯一律釋放。西藏當局一面採取步驟訴請聯合國干涉，同時我覺得最重要的，必須採納印度政府的忠告，力求與中共達成協議，以免遭受更大的損害。因此請佔領昌都的中共部隊司令，將我致中共政府的函件轉遞，要求撤退軍隊及釋放西藏俘虜。大約就在同時，西藏政府再度召開代表大會，以測驗人民對於大局的態度。其中有一項決議使我甚不愜意，他們認為中共軍隊隨時可以侵入拉薩，決意請我離開首府前往藏印交界的亞東，以免受到危險。我根本無意離開而願留在當地，儘力協助人民，但噶倫等也以此為請，迫於輿情，不得已勉強成行。行前任命僧俗噶倫各一人，即羅桑塔西 (Losang Tashi) 和路庚華 (Lu-Khangwa)，授以全權，共同負責處理，除極重要事件由本人決定外，一切得便宜行事。當時噶倫等以為萬一情勢糜爛，我應援四十年前漢人入侵時十三世達賴前例，前往印度暫避；並建議可先將一小部份庫藏運往該國，以備不虞。因此就把金沙銀塊等物由拉薩運至錫金，在該處儲藏

了九年，後來端賴此應用。

旋消息傳來，聯合國大會決議不考慮西藏問題，使我們不勝駭異，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據傳擱置之議係由英人發動，令人尤不可解。西藏一向和英國極為友善，對待我們一如「主權國家」與我們締結條約隱然有承認獨立之意的也是英國，如今，在西藏已三十八年無漢人存在，英國出席聯合國代表竟謂西藏的法律地位很不明顯，其意似謂中國仍為我們的宗主國，實出意外。印度代表的態度也同樣令人失望。我們深感已處於中共軍隊的鐵蹄之下，無人肯予援助。唯一辦法祇有依賴談判解決，適「中共駐印大使」建議我方派代表團赴北平，於是我加派四人協助已在該處被軟禁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晉美，與中共協談，均在一九五一年初到達北平。直至很久以後返回西藏，我人始獲悉事實真相。據他們報告，一行人員抵平後，「中共外長」周恩來即設宴歡迎，席間正式介紹了彼方代表。不久舉行第一次會議，不料中共首席代表立即提出了預先擬就的協議草案，全文計共十條，討論了數日，我方代表堅持西藏為自治地區，並舉出一切證據以資佐證，無奈中共代表不予接受。最後，彼方將草案修正為十七條，不准我方代表再有異議，並且橫加折辱，甚至以用刑對付他們及武力對付西藏為威脅，也不許他們向我或西藏政府請示。

代表們與外隔絕，無可商承，終於被迫簽字，但仍不肯蓋用印章，中共竟鑄造偽印強令加蓋。我和西藏政府都不知已簽訂了協議，嗣在收聽北平廣播中方獲悉此事，聽到報導的條文，極為

震驚，其聲明中措詞的驕橫虛偽，條文的窮凶極惡，令人不可想像。此等條文西藏決無人願意接受，但中共也作了幾項承諾，如保證對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不予更改，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院，發展農業增進人民生活水準，關於各項改革事宜不加強迫等是。鑒於整個西藏主權與人民將盡入中共之手而遭滅亡之痛，這些小惠實在微不足道。但是我們孤立無援，只得飲恨向中共獨裁者屈服，祇望他們對其一手製造的片面強迫協議，能信守其諾言而已。

共首邀我訪問北平

兩個多月後，中共三千官兵開入拉薩，接着又有三千人到達，拉薩民衆顯然以冷漠的態度對之，這種態度祇有在蒙受國恥時始有此表示。起初中共軍方除了要求住處和供應外，與西藏政府很少接觸，但是就因這些要求，不久釀成禍端。他們徵用房屋，同時也自行購買租賃，在河濱勝地夏宮對面佔了一大片土地，用作營地，又索借二千噸大麥。如此龐大數量，政府一時自然不敷供應，於是向寺院及民間告貸才湊湊足數額，其他食物也在需索之列。拉薩原不是物產富饒之區，開始感到生活艱難，物價遂節節上漲。

其後又來了一萬左右的軍隊，另佔去了一大塊營地，當然又要增加糧食供應，肩負如此沉重的負擔，我們的經濟乃告崩潰，拉薩民衆第一次瀕於饑餓的邊緣。他們對於中共軍隊日感憤怒，兒童開始呼口號遊行，並向共軍丟擲石塊，西藏

政府收到的控訴文件如雪片飛來，但一籌莫展。共軍既已來了，對西藏政府不會買帳，根本談不到協助，反之，種種需索却與日俱增。當此日趨緊張期間，一味反對中共只會觸怒它，我深知民情激昂於事無補，如果和他們衝突起來，勝利一定屬於彼方，受到犧牲的必然是我們沒有武器沒有組織的人民。唯一的希望，祇有以和平的態度請求中共實踐在協議中所作的諾言。因為暴力反抗不但無濟於事，而且不合人道。我個人固深具此見，顯然也奉佛祖釋迦的教旨，身為西藏宗教領袖，惟有信守不渝。

處於此種情況，我便接受了中共的堅決要求和內閣的建議，要二位噶倫辭職，中共對噶倫們拒絕需索非常痛恨，此種責任由我親自負起比較妥當。不久，俗籍噶倫倫庚華退出印度，後以年老退休，他至今仍是我的親信顧問。所憾者，在我一九五九年離開西藏後，僧籍噶倫羅桑塔西被中共逮捕下獄，至今尚未釋放。

旋中共政府請我訪問北平，我也認為應該前往，與其最高當局晤面，設法勸他們履行協議中的承諾，故決定成行。乃於一九五四年自拉薩啟程赴平。數年以前，我對物質文明頗感興趣，倘能坐到火車飛機，心中會有說不出的歡喜，但是現值國難當頭，懷於自身責任的重大，再也無心欣賞這些事物。行抵西安遇到班禪喇嘛，彼此結伴同行，其時我年十九他僅十六，他是從極艱難處境中長大的。班禪一如達賴都是活佛轉世，其第一代俱生於十四世紀，從那時起，在西藏的宗教勢力僅次於達賴，不過從不掌理政權。歷代以

來，彼此都能推誠相見，但在一九一〇年左右，第十三世達賴和第九世班禪之間發生了芥蒂，那時漢人犯藏，達賴出亡印度，班禪竟往漢境，後於一九三七年客死異鄉，我相信係抑鬱而亡。當時未即尋覓轉世靈童。一九五〇年藏境發現二人，漢人在其轄境內也選出一人。那時西藏代表正在北平與中共商談，我們的首席代表阿沛當時來電報告，漢方所選的靈童倘不被接受，勢必妨礙其談判的進行。西藏政府及各寺領袖當然想照傳統的規例辦理，但勢不可能，現在的班禪喇嘛遂被承認為第九世班禪轉世，他當時已是一十二歲了。自然他所受的教育與訓練完全受到了漢人的控制，先是蔣總統的政府，其後是共產黨。中共知道他年少易欺不會反抗，想利用他達到政治的目的。一九五三年他曾來拉薩訪問，彼此相處甚得。他照着佛教的傳統規矩，對我非常虔敬，我也油然而生十分親切之感。我確信照他本人的真意。一定衷心支持西藏反抗中共侵略的。

班禪十世訪問拉薩結束，私下前來向我告辭，我說，我們都尚年輕，應該忘了上一代間的芥蒂，一切當從頭開始，他表示贊同。我對於上一代間的嫌隙確實遺憾，至今仍有此感。由於他久經漢人薰陶，我想他未必能完全忘懷，如果他本人以及其信徒果能盡釋前嫌，西藏的災難或可大為減輕，漢人久想把上一代中想做而未做的在我們這一代中再來嘗試，而此時能獲一西藏宗教領袖以資號召，確然對他們頗為有利。班禪本人未可厚非，經常在外人勢力控制之下長大的任何孩童，誰也無法保持其自由的意志。雖然如此，我

訴申的噓喇頓達

仍不信他竟會背棄佛教而信仰共產主義。

在我抵達北平第二天，首度和毛澤東會面。他說，西藏已回到祖國的懷抱，我並已同意並加入人代會，他覺得非常高興，嗣後中共當負起責任開發西藏天然資源，藉求進步。接着要我坦白說出中共駐藏代表有無拂逆我意志的地方。當時我覺得處境非常困難，如不能維持友好氣氛，西藏所受的損害，必然較過去更要慘重，所以答道，西藏人民在他的「領導」之下對於前途抱着極大的希望，倘有不和的情形，早就坦率表示出來了。

第二度和他會面約歷三小時，當時除通譯外並無第三者在場。先是，一九五三年曾到過內地的西藏貿易團員告訴我，中共權要人物對我非常懷疑，主要因為把庫藏移往印度，同時認為我家屬中似有一部份人和外國有密切關係，事實上完全失實。我便乘此機會向毛剖白。至於庫藏問題我說正準備運回拉薩，我心裏確是如此打算，幸而沒有做。毛對我的談話似頗表滿意，所以答稱，決意設立一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並徵詢我的意見。惟因故事體大，非一時所能決定，所以我回答，在未和班禪喇嘛及其餘西藏人商討前，不敢擅作主張。

數日後接到毛的通知，一小時內前來看我，談話中談起佛教來，他說，佛教是一種極好的宗教，釋迦牟尼雖是一個王子，對於改進人民生活問題曾下苦心。不到幾分鐘他就走了。這些話的用意，我簡直莫明其妙。在另一次會晤中，他告訴我，西藏人的思想非常頑固，但二十年後它會強盛，現在由中國幫助西藏，二十年後則西藏將

會幫助中國，這些話又使我大為驚奇。在我訪華日程行將結束時，最後一次去見他，我坦白說出對參觀過的一切開發計劃印象極佳，而且很感興趣，於是他開始說了一大套有關真正民主方式的話，並教我如何做人領袖之道，以及如何聽取人民的意見。接着把身子湊近前來低聲說道，我對你非常瞭解，但宗教確是有害的，它有二大缺點，一是無形中使民族頹廢，另一是阻礙國家的進步，蒙古和西藏都深受其害。這一席話使我震驚不置，不知其真意何在，我力持鎮靜，但仍無法置答。當然我知道他是宗教的死敵，但從外表看來，他對我友愛有加似由衷誠。當我們一齊走出大門時，他僅叮嚀我保重身體而已。

在離開紅色中國以前，我堅信毛是這樣的一個人：貌不驚人看不出有才華，健康不佳時常氣喘，行動呆笨說話緩慢，語短意深簡單明瞭，談話時吸煙一刻不停，可是他說話的姿態極為動人，有一種親切誠懇之感。當時我深信毛本人決不致以武力迫使西藏成為共產國家，當然後來看到了中共在藏境所採的種種壓迫政策，錯覺遂告消失，但那種政策出諸毛的核准與贊成，直到如今猶難相信。

在紅色中國停留將近一年所獲的一般印象是：工作有效率，物質方面有進步，一切刻板無生趣，中國傳統的彬彬有禮談笑風生僅在歡迎場合偶一表現。這種極端的呆板一律，當然是共產主義威脅力量所造成，但我不信中共能把西藏人民也壓服到如此狀態。在我準備啓程返藏之時，仍望拯救人民免於中共統治的惡果。自認此行有二

項收穫，一是確已發現實際遭遇的問題，更重要的，似已說服中共勿照原定計劃由北平經由軍政委員會直接統治西藏。另外，內政方面我們似尚保留一部份權力，並已獲得自治的允可。以離藏日久，彼處情況極為懸系，遂返故土。

尼赫魯的適時警告

自北平返藏途中，曾至我誕生地訪問，在此番黯淡的旅途中，自不失為一項愉快之行。我出生於卑微而純粹藏人之家庭中，而引以為傲。訪問期間，重溫兒時舊夢，尤深快慰。但當我與人民晤談時，則立刻回返現實。我問彼等是否快樂，他們答稱：「在中國共產黨及毛主席領導下極為快樂而富庶。」但言時熱淚盈眶。我鑒於他們對我談話，尚不敢不按照中共之方式發言，不禁駭然。

我特至西藏東疆與中國官吏會面，彼等態度惡劣，毫無同情。某將領率直告我，為推行改革起見，將有更多軍隊前來，至於人民向背如何，則在所不計。處於中國境內藏人之前途，顯極黑暗。

最後我回到拉薩，安抵夏宮。宮外為中共兵營，威脅如故；但宮內之安靜優美，以及各種宗教活動，亦如往昔。拉薩城內依舊安謐，人民對東疆方面之激烈變革尚無所知，我所見到之怨恨情況，亦未為中部人民所完全瞭解。

但自一九五六年初孟蘭節 (Monlam Festival) 以後，則情形漸漸不同，一般人民對中共之仇恨突見高漲，人民且自動推舉其政治領袖，

則為西藏歷史上之創舉。所謂政治領袖，並不類西方各國之政治人物。彼等同為西藏人民，且同受艱困，同懷忿怒，但較具才幹，能發為言行而已。拉薩人民即在彼等之領導下，進行組織。其目的乃欲反擊中共，以洩其忿。他們因此與我之內閣發生衝突。內閣與我均認為反擊中共軍隊實屬無益之舉。有時我為人民着想，不得不加以干涉，以阻止彼等之暴力行為。彼等可能因此懷恨，但對我之忠誠，則始終不渝。此非由於我之品德，實係彼等暨所有藏民對於達賴之觀念信守不移，而以為之奮鬥之象徵。

彼等在孟蘭節之活動，使此盛會深具政治色彩，而與以往截然不同。各種傳單到處分發，要求中共離境，藏人自治。中共將領遂召見內閣閣員，嚴加責備，並指名要求逮捕三名政治領袖。實際上若輩並無違法之事，但中共以逕行拘捕審問相威脅，逼迫內閣加以逮捕緊獄。其中一人瘐死獄中，其餘二人得拉薩三大寺之擔保，不久被釋，內有一人至今仍隨我在印。

我之處境較二年前益見困難，一切和平解決之企圖一一失敗。尤為可慮者，我對人民之控制力量漸漸消失。東部藏人被迫採取野蠻行動，中部方面亦益具決心，而欲訴諸暴力。適於此時，我承邀訪印，第一次與尼赫魯暢談。旋即決定暫時留印，以待中共政策之轉變。我作此一決定，實為情勢所促成，原非得已。

此次在印，我生平第一次遇見同情西藏之外人，其中頗多飽學之士。且身居甘地故鄉，深受感召。故我之決定可能受此影響，我認為我縱回

藏，將無法阻止藏人之採用暴力，反不如留印，至少可將西藏情形，昭告世界，以爭取道義支持，或可促使中共變更其暴虐政策。我與尼赫魯單獨會見時，僅舌人在座，遂將此意告知尼氏，但渠深信目前藏事已無可設法，並勸我回藏，再圖採取和平步驟，實施與中共所訂立之十七點協定。周恩來在德里也告訴我西藏情況轉劣，勸我回藏，並暗示如果發生叛變，則他將以武力壓制。所以我告知尼赫魯決心回藏。

其時在中共統治下之西藏東疆以及東北疆所發生之可怕情事，漸由難民口中，知其梗概。但詳情如何，恐將永無明瞭之日。該處康巴族人參加游擊之人數，已由數百人增至數萬人，並已與中共軍隊發生戰事。

中共使用大砲暨轟炸機，不僅對付游擊隊，抑且對付村落及寺院，蓋懷疑其支持游擊隊之故。結果，村落寺院全被摧毀，喇嘛及人民領袖多被囚辱，甚或殘殺刑虐。土地則被沒收，佛像典籍則被焚燬損毀，或被劫掠而去。可見中共原欲爭取藏民效忠祖國之企圖，至此已告放棄，至少在東疆如此。藏人素不向暴力低頭，且視宗教為立國之寶。中共採取蔑視藏人宗教之政策，實屬瘋狂，結果徒增反抗力量。我回拉薩不久，東疆、東北，甚至東南一帶藏民均已武裝。即在拉薩，中共與內閣之間亦公開決裂，爆發已迫在眉睫。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我向駐節拉薩城內，準備歡渡孟蘭節。兩位中共下級軍官來見，告以駐藏三位將領中之「譚冠三將軍」欲我指定一日

期，以便邀赴其軍營中觀劇。當告以一俟孟蘭節於十日內結束後，即行安排日期。

我於三月五日移節夏宮。二日後，譚某又僅請指定日期，乃經僧官轉告，定十日前往。此事迄至前一日並未作任何安排。九日晨八時，兩個中共軍官邀我的侍衛長前往中共司令部，見其軍事顧問傅少將。侍衛長返回夏宮，狀甚焦慮。因傅少將告彼，我前往時不得有任何儀式，亦不得隨帶武裝侍衛，所有藏軍不得逾越石橋。如必須隨帶侍衛，則以二三人為限，均不得攜帶武器，且此事必須嚴守秘密。

中共營地以石橋為界。中共駐軍距夏宮僅二英里，原已為任何愛國藏人所難忍。但如中共駐軍嚴守約束，尚可相安無事，今竟欲邀我隻身前往其營地，則藏人將大為不滿，此節為我的侍衛長所深知。

中共邀我不帶侍衛前往，事極奇突。依照慣例，我往任何地方必帶武裝侍衛二十五人，並由武裝士兵沿途戒備。故中共之邀請，人人認為可疑。尤以中共欲嚴守秘密一節，更滋疑竇。且除非實施戒嚴，我的行動實無法保密，每次我外出時，拉薩人民常夾道相迎。況時值孟蘭節後不久，僧侶多四散，但逗留拉薩者尚有數千人。此外康巴族難民聚集藏京者，亦達數千人。約略估計，當時拉薩人口可能有十萬人，為歷年最高者。

我的官員為維持次日之秩序起見，決定沿途佈崗，直至石橋，並設法不使人民湧過石橋。又囑警察轉告人民，明日將限制交通，任何人民不許經過石橋。此種措施原屬善意，但謠言突起，

謂中共計劃將我劫持。當晚羣情激動，次晨，闔城人民自動決定不惜任何代價，阻我前往。

堅守宮殿誓不撤退

當時盛傳東疆方面有四地之高級喇嘛，為中共軍方分別邀宴時扣留，其中三人被害，一人尚被囚禁，故人民疑慮益深。但官員們並未阻我前往，閣員們決定隨我同往，俾禍福與共。當晚我憂心忡忡，無法安眠。次晨五時即起，循例進入祈禱室，一切平靜如恆。青燈高燃，芬芳之氣息充滿室內，禱告畢，我下樓至園內散步。時旭日初昇，初春氣象，隨處可見。此為我最後所享受之內心平安。不久園外即發生叫罵聲，我急返室內，命近侍出外探問。旋據復告，拉薩人民似已將夏宮包圍，聲稱願為護衛，並阻我前往中共兵營。有人估計，宮外人民達三萬以上，其忿怒之情且與時俱增。

九時左右，閣員二人乘中共之吉普車，並由中共人員駕駛，前來夏宮。進宮時，未為人民所阻，但人民見中共之駕駛人員，益見緊張。不久，另一閣員與一中共軍官同乘其自備車，亦來夏宮，此一閣員新任不久，尚未為一般人民所認識，如彼一人前來，尚不致引起誤會，由中共軍官伴同，民衆乃認定汽車係中共所有，而中共軍官係前來邀我往中共兵營者。

在紛亂中，有一人向中共軍官投擲石塊，一時羣起效尤，不但汽車被擊中多處，此位閣員頭部亦被擊中因而昏倒。同時又一閣員驅車到達宮外，亦為民衆所阻，不能前進。閣員中親見此種情

況者，均認為為避免危機起見，必須迅速採取行動，因羣衆可能進攻中共司令部。當時民衆已推出六七十人，組織委員會，宣誓將包圍宮門，阻止我外出。

我明瞭此時人民之心理，已無法加以控制。稍後，某一僧官，素以親近中共出名者，被憤怒的民衆用石塊擊斃，使我悲傷之餘，益信所見之不謬。故囑內閣轉告中共將領，謂我不能前往觀劇；且在目前情況之下，中共方面人員亦不宜前來夏宮。

當由內廷官員將此意用電話告訴中共將領之譯員，並表示歉意。譯員亦認為此項決定係屬正確，當允轉達。

我又命閣員將此意告知人民，並於正午用揚聲器轉達。民衆報以歡呼，但仍堅持不但今天不往中共兵營，以後亦不前去。我亦表示接受。民衆選出之代表遂多散去，但大多數人民仍留守宮門。

下午一時，我派閣員三人往見譚冠三「將軍」，俾當面加以解釋，時宮外人民為數仍多，發現三閣員外出，深恐我亦同行，遂不允放行。經閣員再三解釋，並任其搜查座車，證明我並不在內後，始許離去。當時民衆之發言人告訴三閣員，人民將自選侍衛，嚴密守護，以防中共人員將我帶走。雖經三閣員力加勸阻，仍無效果。

當天下午三閣員回來見我，謂譚冠三「將軍」曾嚴辭訓斥，極無禮貌。大意是西藏官員違抗中共命令，拒絕收繳在拉薩康巴人之武器；為催毀此種反抗起見，將採取嚴厲措施云云。其他兩

位中共將領亦加以責備，其中之一謂「毀滅一切反動份子」的時機業已到來，又謂中共政府過去一直寬大為懷，但對目前之叛變，則不能再事容忍，而必須有所行動。此三閣員極感惶惑，認為三將領之言係最後通牒，如民衆不能即刻回復安靜，軍事行動即將發生。他們認為達賴個人之安全將受威脅，一旦發生不幸，則西藏將無噓頰。其時為下午五時，一部份民衆業已散去，但仍有許多人留守宮門。嗣後始知散去之人民係回城召開羣衆大會並舉行反共示威遊行。

當晚六時，約有七十名官員，多係中下級者，以及民衆選出之領袖與衛隊營人員在夏宮內廣場舉行會議，通過一項宣言，表示不再承認中共之權力，我的衛隊以後亦不再接受中共軍官之命令，並即脫下中共之軍服，恢復藏裝。我得知此事後，即訓誡彼等之領導人，告以其責任為解除當時之緊張局面，而非增加困難。

當時晚間，譚冠三「將軍」派人送來一函。此為其今後數日內送來三函之第一封，均經我逐一答復。這些函件於拉薩事變以後，經中共方面公佈，用以支持其所宣傳之謊言，即我當時係為「反動派」所劫持，曾請求中共司令部之庇護，以後又被擄赴印度云云。此種謠言經外國同情中共之報章所轉載，並曾在英國上議院為某上議員所引用。

事實適與此相反。我離開拉薩完全出於自願，因當時處境絕望，不得不走；未遭任何人挾持，亦未受任何人之壓力。當時在拉薩之西藏人均明白中共已準備砲轟我宮殿，我如不走，生命將

發生危險。

至次日，即三月十一日，拉薩人民益難控制。他們已在夏宮內閣辦公處設置六個崗位，不許閱員外出，蓋恐其與中共妥協仍許中共留藏。內閣隨即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召集民衆領袖商談。此時譚冠三「將軍」又送來兩函，分致我及內閣。致內閣函中謂，「叛徒」在拉薩以北通中國之公路上設置障礙物，命令即予清除。民衆領袖拒絕照辦，因此舉之目的即在保護夏宮，使中共後援部隊無從入城。如中共堅持清除，民衆領袖認爲其目的即在攻擊我宮殿，並將我俘虜。

人民之態度益見強硬，自行推派六人爲司令，加強守衛宮殿並宣佈無論如何決不撤退。

以後兩日即在緊張氣氛中渡過，彼時我等明瞭中共之企圖乃在摧毀宮殿之民衆，但仍希望在可能範圍內不殺我而已。

宮內情況已陷入極端緊張中。宮外爲激昂忿怒之人民，大多數已攜帶刀棍等武器，其中亦有士兵及康巴人，他們則有步槍及少數機關槍，甚至有十四五尊迫擊砲。如私人鬧毆，則一個西藏人可抵十個中國人。但中共重武器犀利，自難抵抗。彼等所憑者僅保護我之決心而已。

至十六日晚，人民確知中共將砲轟宮殿，遂益見激動。次晨，內閣致函與中共保持接觸而於危機發生後迄未參加閣議之閱員阿沛，建議其設法協助我赴中共兵營，該函之目的僅在與中共將領修好。事實上，我決不可能前往。阿沛復函表示欣慰，並允諾以後再詳細函復。但其第二次來信到達已在事變結束以後。

秘密逃亡經過曲折

當日下午四時，中共發砲二發，彈落北門外沿澤地帶。人民之驚恐忿怒遂達頂點，以爲轟炸宮殿業已開始。宮內人心惶惶以爲末日來臨，但如何應付則無人能作決定。故我必須立刻採取行動。我對世事並無豐富經驗，決定這件大事，並非易事。我並不畏死，且深知本身僅爲永生主宰之工具，並非不朽之軀，但我的人民及官員並不如如此設想，而認爲達賴係代表西藏及西藏之生活方式，乃無上珍貴者；如我死於中共之手，則西藏亦將消滅。故砲發後，宮內外所有官員及人民均認爲我必須即刻出走，以策安全。

此一決定並非易事，因其關係整個西藏。如出走，則安全並無把握，中共亦可能因此毀滅城市，虐殺百姓。但人民亦可能因我已出走而離開宮殿，遂得保全其生命。其時一切均無把握，但人民則一致欲我離開。如我不走，將增加人民及親友之困難，故我在禱告神佑，並蒙指示後，決心離藏。

我決心離開拉薩，隨行者有四位閱員、我之教師、侍衛及家屬等。但行程如何，目的在何處，尚無法預定。又同行人數雖多，但必須嚴守秘密，非但不能使中共偵知，抑且不能告知守衛之民衆。一則恐有中共特工人員混跡其間，再則人民如知我遠行，必將隨行保護，必爲中共所發現，殘殺將不可避免。故我及閱員僅告知民衆領袖，請其守密，並避免開火。一面我又允許一旦脫離危險，再行下達詳細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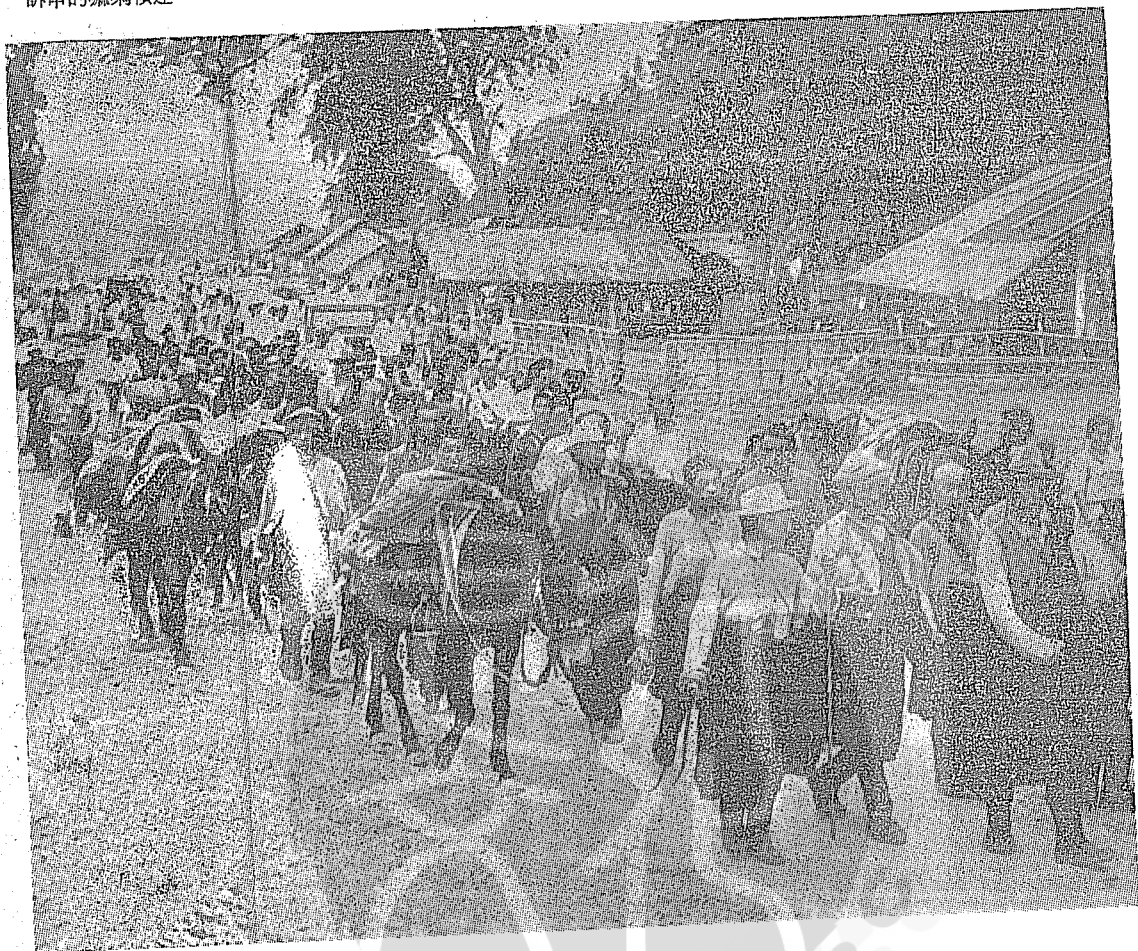
我等必須於黎明前遠離拉薩，故僅能攜帶印璽及手邊之文件，所有歷代所遺傳之珍寶，均不得不放棄，亦無法向國庫支取現款。行前我又到佛殿行禮告別。其時所有僧官均已改易俗裝。照我等之安排，我父親及姊弟等均喬裝康巴男人先行，我第二批出發，其餘閱員等殿後。我亦改易士兵軍服，戴皮帽。臨行時，最後一次昇登御坐，誦讀佛經。適讀至佛祖訓示，應具大勇一節，讀後遂熄燈離座。

我隨同士兵二名離室，經過花園到達宮門。我一生離開夏宮而不帶儀仗，以往僅有一次，即九年前赴亞東。離宮門時，尚依稀見成羣人民澈夜守望。我既化裝爲士兵，故未被彼等注意。

我等乘皮筏渡江，我家屬已在彼岸相候，不久閱員等亦相繼而至。我們乃與民衆領袖互換哈達。此行一切準備事宜均承彼等安排，極其週密。我等乘馬啓行，隨行者約有康巴士兵三十名。

凌晨三時，抵一民房，承居停相迎。以後行程中沿途亦多留宿民家，但均經隨行人員事前安排，其間頗多不知我真正身份者。至此康巴族領袖另派四百名士兵沿河戒備，又增派二、三百人隨行保護。

我離夏宮時，及在第一段匆忙之行程中，尚未決定逕赴印度；我仍盼暫留藏境。自拉薩西南行往印度之大道，有中共軍隊駐守，我等自無法前行，故先繞道東南。此去爲廣大山區，並無道路，中共軍隊將無法大量深入，且爲康巴族暨其他從事游擊之藏人所據守之根據地。由此山區中心有數條小路，可以通過喜馬拉雅山而達不丹，數



。列行亡流胞藏的度印往逃藏西自，害迫匪共堪不

世紀以來均為西藏及不丹貿易商人之捷徑。故到達此地後，尚可為撤退之準備。

我等一行現已增至一百人，並有三百五十名西藏士兵及五十名游擊戰士隨行保護。最初五日中午，我等於白天分批前進，晚間留宿村落或寺院。各游擊首領有時相伴而行，有時則否，但彼等已互相聯系沿途照拂，極其忠誠。

拉薩方面我的私人秘書有信馳達，其他目擊之藏人亦陸續趕來加入我等之行列。故我等離開拉薩後之情況，乃漸明瞭。中共砲轟於三月二十日凌晨二時開始，即在我離宮四十八小時以後，其時中共尚不知我已離去，而其砲轟之目標即係夏宮，且砲轟竟日。以後又轟擊城內之官署及寺院等。死傷如何無人知其確數，但夏宮內外，死者以千計。夏宮內除佛殿保全外，其餘毀損極重。城內民房損失亦甚慘重，主要廟宇之金頂則告洞穿，相連之佛殿亦遭蕩平。

中共砲轟夏宮之後，即派人進宮逐一檢查屍體，其目的顯係調查是否有我在內。至晚間，中共始知我已離去，遂再度轟擊城內洩忿。無辜民衆死傷數以千計。可見中共之目的乃欲將我置之死地。

中共暴行之目的何在，僅能有一種解釋。西藏經中共八年統治以後，已經證明西藏人民決不願受外人之統治，故中共乃改採屠殺政策，欲藉以強迫西藏人民屈服於其淫威之下。

至此，我乃不得不離開西藏。勉強留藏不但無補於事，且最後難免為中共所俘。故唯一出路為逕赴印度，請求印度政府給予庇護，藉以保持西藏人民之希望。但此種思想當時為我所極不願接受者，故仍舊向隆子宗進發，希望在彼處重新設立政府。且當時已悉中共已宣佈

將西藏政府解散，深恐部份人民不明真相，誤以爲中共此項措施係得我同意，因之另設新政府一節，更不容稍緩。我等抵隆子宗時，成千人民，遠道出迎，儀式極爲隆重。到達後復舉行宗教儀式，宣佈臨時政府之成立，分別通知全藏各地。我等又繼續向印藏邊境前進，但爲雨雪所困。乘馬又疲乏不堪，必須時常步行，故我等進行速度至爲緩慢。全世界之友人均不免懷疑我等之行蹤究在何處。

又行兩日後到達西藏邊界，我派往印度接洽之官員已在等候，並傳來佳音，謂印度政府願意給予庇護。當晚因所處地點已遠離中共，始解衣暢睡。

不幸氣候益趨惡劣，大雨傾盆，所住帳篷又有漏洞，我遂病倒，次日不能繼續前進。其時印度之無線電臺忽廣播我旅途中墮馬受傷，深幸所傳並非事實。

當日經決定隨行之宗教及政治官員一律與我同赴印度，軍事人員則仍留藏境，繼續與中共作戰。至第二日，我仍未癒。但爲早日解除隨行保護康巴士兵之責任起見，決定即行進入印境。遂扶病啓行，於困倦悲傷之情懷中與祖國告別。

附錄 王成聖教授著：

關於「藏族」與「西藏地方」

我國邊疆少數民族，與內地同胞，無論在文化上，或血緣上早已互相融合，無論漢、滿、蒙、回、藏、苗、保都是中華民族的構成分子。尤

以藏族同胞散居甘、青、川、康等省區者甚多，西藏各世達賴班禪喇嘛多出於青康兩省，共匪竊據大陸，西藏最後淪陷。達賴喇嘛不堪共匪迫害，逃抵印度之後，時常發表言論，號召藏族同胞團結一致，共同奮鬥。藏族受達賴精神感召，在青、康、藏各地紛起抗暴，曾獲得全世界之同情與重視，惟外電報導常將西藏地方與藏族混爲一談；少數不肖分子，不明國家民族大義，妄圖利用藏族即西藏族的說法，認爲有藏族分佈的地方，都是西藏的領土，西藏領土之內，任何別族人民都不可以享受和西藏人同等的權力。達賴喇嘛受這些人的影響，他的言論在措詞和用語方面，頗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對此一問題，特提出以下數點意見，以供關心西藏問題者之參考。

一、西藏地方與藏族，不能混爲一談；西藏位於西康正西，其境域東抵寧靜山，北至當拉嶺，南踰喜馬拉雅山，西接喀喇崑崙。西藏一詞，就地理上言祇能包括(1)衛部(拉薩附近地方，約五萬方公里)。(2)藏部(衛部之西，雅魯藏布江上游，日喀則、江孜、薩迦等地方，約六萬方公里)。(3)阿里(藏部之西，印度河上流，噶大略一帶，約十萬方公里)。(4)羌塘(外喜馬拉雅山脈以北之大荒原，面積近三十萬方公里，爲大湖沼地帶，藏語羌塘，即北方荒原之義)。(5)工部(衛部之東，工曲流域，舊作工部，民國擬設太昭縣)。(6)波部(工部之東，波曲流域——博藏布江流域，二萬八千七百方公里，舊作波密，清末曾擬設兩府一道，隸西藏省)。(7)拉里(工部之北，二千方公里，清設糧臺，民國擬設嘉黎縣)。西藏地方居民，蓋多屬藏族，但藏族之外，尚有漢族及其他各族同胞，如達賴之兄嫂嘉樂頓珠夫人朱丹即爲漢族，並非藏族。共匪竊踞大陸後，不堪共匪迫害而逃往西藏之內地同胞，尤日漸增多。

二、藏族除分佈在西藏地方外，西康、青海、甘肅、四川、雲南等省亦所在多有，一般人稱藏族爲「西藏族」，已屬不妥，而藏族自稱爲「西藏族」，尤大謬不然。蓋川康人稱藏族曰「西藏族」，係因其處身於西藏地方之東，故而稱西藏地方之藏人爲西區藏人，但西藏地方的藏胞竟稱聚居於其東面的西康藏胞爲西藏族，豈不謬之千里！如必欲在藏族二字之上冠以方位以示區別，則西藏同胞對西康藏族之稱呼，應爲「東藏族」。

三、共匪非即漢族之代表，漢族同胞受共匪之迫害，較之藏胞尤有過之，藏族同胞反對共匪迫害是正確的，但不應該反漢，如把反共反漢兩事相混淆，不僅收不到反共效果，並且無形中幫助了共匪，這是最愚不可及的事。

四、有人企圖利用藏族即是西藏族的說法，認爲藏族分佈之處原爲西藏的「領土」，而從事所謂「獨立運動」，這純粹是受人利用，妄圖遂其個人野心的幼稚想法，斷無成功可能。彼等必須了解，此一幼稚的想法和作法將必引起西藏境域以外，川、康、滇、甘、青等省漢回保各族之反感與反對，尤其是居住於西藏境內與日俱增的漢人，更將誓死抵制，如此不僅分散了反共力量，更授匪僞統治者以可乘之機。吾人特於此寄語

(一) 告報輯編

達賴喇嘛，以及他左右的智囊們，凡事三思而行，千萬不要再發表或作出使親者痛仇者快的言論和行動。

五、處理西藏問題的最佳途徑，是遵奉國父遺教，切實做到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並保障少數民族利益，關於此點，中華民國憲法第二二〇條明文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因此可知，西藏地方之自治制度，惟有在中華民國憲法之保障下，始克達到目的，亦惟有反攻大陸，推翻匪偽暴政，西藏同胞始能享受充分之

自治。

此外，我中央政府及西藏政教領袖必需注意兩點：在西藏地方，藏族以外之漢族和其他民族才是真正的少數民族，他們的生存和各種權益應該切實予以保障（共匪除外），對於熱愛西藏，世居西藏從事建設開發工作的藏族以外其他各族人士，應該得到適當的優待和獎助，否則，這些人爲求生存，便會有他們自以是的手段去處理他們的事務，如此，很容易傷害到民族感情，造成民族間的不和諧；散居在西藏境域以外如川、康

、滇、甘、青的藏族同胞，在各該地區來說，是絕對的少數民族，因而他們的各種權益應該切實予以保障，關於這一點，吾人相信，蔣總統領導之下的中央政府絕對辦得到，可惜現在共匪竊據大陸，我們的政府鞭長莫及，因此目前最迫切的是不分民族，宗教和黨派，團結一致，在蔣總統領導之下，從敵前（金、馬）和敵後（印藏邊區），反攻大陸，消滅共匪，一俟摧毀匪偽政權，藏族同胞便可獲得充分的自治權利，過着自由民主的幸福生活。

編輯報告（一）

△本期中外雜誌送到讀者手中時，恰值歲暮云暮，不幾天就要歡渡農曆新年了。中外全體同仁謹以一片虔誠，敬祝全體讀者健康快樂，事事如意，在明年這一年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能以獲得最大的進步與成功！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的成都大撤退，曾經身歷其境者，必定至今記憶猶新。當年賴成都防衛總司令盛文將軍麾下的健兒浴血奮戰，壯烈犧牲，方始力禦數以十倍計的共軍，支持到最後一刻，方使中央機關留蓉人員及重要文件，相繼接運來臺。成都保衛戰，可歌可泣的事跡，以及盛文將軍化裝逃出鐵幕的曲折離奇之際遇，構成了近代感人至深的忠孝節義故事，頃

由盛文將軍以回憶錄的方式和盤托出，是爲辛亥新春中外雜誌對讀者所作的一項重大貢獻。

△安陽古物出土，曾是轟動海內外的一大新聞，對於歷史的貢獻既深且鉅。石璋如先生是當年的主持人之一，茲由名作家劉震慰先生筆記，石先生復核補充，寫出他在殷墓之畔渡過三個陰曆大年夜的往事。從究否有鬼寫到羣盜被擒，妙趣橫生，可爲讀者最佳談助。

△汪公紀先生的日本皇室軼事越寫越精采，備受各界讀者的稱頌和讚揚，本期他又爲中外讀者寫下「日本皇室封妃立后繼位奇聞」，不僅增進我們對日本歷史的深切認識，而且其本身就是波譎詭秘，引人入勝的傳奇故事。

△滿清建設新軍，不但傾全國之人力物力

編者

與財力，尙且對於一部中國現代史產生了最深鉅的影響，頃由軍事史專家魏汝霖將軍爲中外雜誌撰：「滿清新軍志」，廣徵博引，考證精確，是當代有識之士不可不讀的一篇重要史實作品。

△王培堯先生的「近代風雲人物」，本期中外雜誌又連續發表袁世凱、康有爲、梁啟超三篇，內幕秘辛，躍然紙上，月旦之評，精確允當。值得一讀再讀，當能發人深省。「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與傳記之所可貴者，厥在於此。

△本期正在印刷之際，又收到勞幹教授及張德粹教授大作各一篇，將於下期刊出，特先敬告讀者諸君。